



外公在他的著作中写道：“国剧来源于古代之歌舞，由宋朝始杂剧说起，已有七百年的历史。由唐朝梨园子弟歌舞说起，则已将千年”，“这里头当然应该有有价值的部分”。可惜的是“不但没有人研究它，甚至于绝对不谈它，以至古来的这样有价值的一种艺术只是艺人间薪火相传，无扎实的研究和文字记载，真是太可惜了”。

于是无论什么时候，什么地点，他逢人便问，每逢看戏，他在后台，总有人来围着说话，他们很愿意告诉他，关于衣服、盔头、勾脸、把子、检场、音乐等。当时所有的名角都不只一次地被外公访问过。与戏剧界交往非常广泛，不分好坏角儿，连后台管水锅的人也都认识，都询问。几十年的功夫，就这样大约询问了三四千人。

## 不由恒蹊——齐如山为戏而来，为戏而去的一生

■贺湘善

齐如山先生是我的外公，我母亲齐长是齐如山的长女。我和外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只有短短的一年多，但他对我们的关爱、对我一生的影响，使我永志难忘。

我对外公的情感源于我家和我个人的经历，我父亲青年时立下农业救国的志向，曾就学于北京农业大学、日本早稻田大学农学系。回国后任济南示范农场场长，做农业技术传播推广工作。抗战爆发后，我们家由北向南不断迁徙，我就是从湖南老家迁到广西。后来又由湖南迁至广西，我至今还记得躲避日军轰炸的情景。不幸的是，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前夕，在颠沛流离中生病去世了。

贺家，曾是湖南的名门望族。在嘉庆、道光年间我祖上有三人考取进士，在乡间被誉为“一门三进士”。其中一位官至云贵总督，退隐后主持岳麓书院。抗战胜利后家境已近败落，乡间无人主持，城中家产毁于战火。在此危难时刻，外公及时伸出援手，召唤我们到北平去，到外公家去。当时铁路不通，我们就走水路，顺湘江经洞庭湖入长江到武汉，再换船顺江东去到达上海。住在三舅齐熙家，在上海又停留了半年。再从海路去塘沽，四舅齐耀

重要的是从此有了读书的机会。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按部就班地读到了大学毕业。

1948年底，外公去了台湾，和我相处只有一年多，但他对我们的接纳、对我们的关怀，对我一生是个重要转折。虽然至今已事隔近七十年了，但对外公的感恩之情却益发日久弥坚。我和外公一起生活的时间虽不长，但从外婆和长辈们的口中，从我阅读外公的著作中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

在纪念外公百零五诞辰时，台湾学者陈纪滢先生撰文写道：“过去若干年中，大家都称他为‘国剧大师’，是‘梅兰芳的老师和恩人’，是位剧作家，这些称谓、头衔都不错；但在他同时能编剧的不只他一人，且每个人都有扶持的对象，有恩于某人，为某人老师，剧本也有贡献。但把国剧理论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内的，则只有齐如老一人！”

外公原本并不是研究戏剧的，当他有此打算时，已是人到中年，他能有如此成就，我以为是多因素的综合。

首先，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，有深厚的国学渊源。外公的祖父、父亲两代进士，但齐家参与科举只为学问不为仕途。外公自幼手不释



齐如山与梅兰芳在赴美轮船上(1930年)

游历、办理商务，期间在巴黎、柏林、伦敦观看了大量的西洋歌剧、话剧。外公自幼喜欢京剧，自然而然地进行了中外的戏剧比较研究。一次戏剧总会开会请外公演讲，在三个小时的讲话中，主要讲了中外戏剧的比较，结果大受欢迎。会长谭鑫培对外公说：“听您这些话，我们都应该愧死”。也有的演员对外公说：“谭老板一辈子没说过别人的话，今天跟您这是头一句”。这对当时的中国京剧界无疑是注入的一泓清水。

开阔的眼界不但是成就外公事业的重要因素。也使他完成了很多非他莫属的戏剧界大事。比如，成功策划、组织了梅兰芳访美，又如，他力排异议力挺梅兰芳接受两所美国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。外公对人来说，他并不在乎博士的虚名，而是为了梅兰芳的尊严、人格和健康的心理状况，这对中国京剧跻身于世界戏剧之林也是有裨益的。

其三，创新精神。台湾学者张其均先生在《齐如山回忆录》序作中有一段话：“齐先生为学、为文，都注重创造的精神。他在《人生经验谈》里有一段话，题目‘不由恒蹊’，他自称佩服这四个字。”外公对“不由恒蹊”的解释是：“不走别人常走的路。他说：‘盖人生一世，若没有创造性，那是一点成就也不会有’。”“不由恒蹊”四字，比“有创造性”四字较好，而没有毛病。

外公认为“不由恒蹊者，是有恒蹊而不由。但你必须知道恒蹊是怎么一条道路，不但需知道，还要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你才能不走它，而另走它道”。他举例说“唐诗是唐朝人所创，人人说它好，可是他若不熟悉诗经，不精研汉魏六朝的诗词等等，他绝对不能创作出唐诗来；宋词元曲也是如此，他但须熟悉诗经及汉魏

辞赋，而且须精研唐诗，否则也创不出宋词元曲来。周朝的诗经，汉魏的辞赋，就是唐宋元等朝学者的恒蹊”。外公讲的实际上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问题，他不仅在理念上崇尚“不由恒蹊”，而且在京剧的研究、创作、革新上身体力行的，这些都是外公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。

其四，做学问的科学方法。我外公原来并不是研究戏剧的。他从听戏，到编戏，到研究戏，到成为一代宗师，除了其他因素，做学问的科学方法也是其事业成就的根基。外公在他的著作中写道：“国剧来源于古代之歌舞，由宋朝始杂剧说起，已有七百年的历史。由唐朝梨园子弟歌舞说起，则已将千年”，“这里头当然应该有有价值的部分”。可惜的是“不但没有人研究它，甚至于绝对不谈它，以至古来的这样有价值的一种艺术只是艺人间薪火相传，无扎实的研究和文字记载，真是太可惜了”。既然没有现成的书可借鉴，就只有询问。于是，外公深入基层从调查研究开始。

外公在其著作中写道：“无论什么时候，什么地点，我是逢人便问，每逢看戏，我在后台，总有人来围着说话，他们很愿意告诉我，关于衣服、盔头、勾脸、把子、检场、音乐等。只要他们不忙，我就坐在旁边问长问短，都是勤勤恳恳告诉我。”访问名角与名角谈话，当时所有的名角都不只一次地访问过。与戏剧界交往非常广泛，不分好坏角儿，连后台管水锅的人都认识，都询问。几十年的功夫，大约询问了三四千人。

他常常带着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，一面问，一面写。每天回家便把当天的问答一一记录在另一个本子上。天长日久，本子一尺高一摞，共有四摞。他把所有听来的话，不管它合

理与否，总要一段一段的研究。研究之后，再归纳，再断定，再与各名角审查其是否还有疑义。经过这样一个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的过程把材料整理好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深入基层，调查研究，接地气。

其五，勤奋一生。外公做事肯出力，有韧性，持之以恒。他的勤奋令人感动。外公结识梅兰芳起因于他看梅兰芳演出的“汾河湾”。他认为梅兰芳在嗓音、唱腔、扮相、身段等方面有很高天赋，但观整场演出尚有值得商榷提高之处。鉴于当时社会环境见面有诸多不便，于是提笔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，从一招一式，一颦一笑到感情如何渐进高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梅兰芳的演出，发现全都按他的意见改了，剧场效果极佳。外公写信的劲头越发不可收，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写了百十来封，平均每周一封，直到二人见面为止。蝇头小楷，要说清每处改动的原委，是何等繁琐，何等费时费力，但外公坚持下来了。

著作等身也是外公勤奋的体现。他新编、改编剧本40余出，戏剧专著30余种，和梅兰芳合作时期以戏剧、剧本为主，抗战时期无戏可写，就改写民间文化、民俗、语言等方面内容。在北京时期共写了七百万字。到台湾时已经七十多岁，没有带只字片语的资料，又写了二百多万字，又开始写剧本、培养青年演员。外公的一生，笔耕不辍，勤奋积累了学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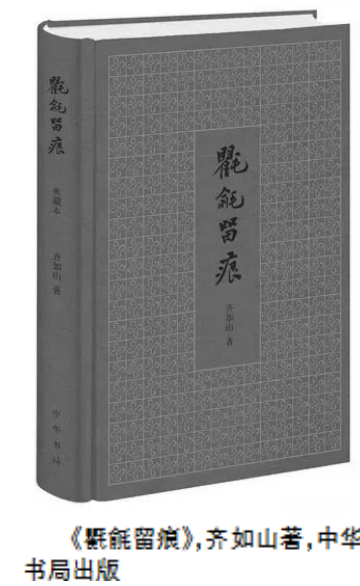
外公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有以上诸多因素，但最根本的是兴趣，是他热爱戏。兴趣是学习和工作的最大动力。当时社会上有两种人围着戏转，一种是“捧戏”的，一种是“蹭戏”的。捧戏的“捧角儿”、包堂会，甚至一掷千金；蹭戏的跟着戏班子蹭饭吃。外公既不是捧戏的，也不是蹭戏的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是吃饱了来的！”他对戏剧所做的一切，是发自内心的对戏剧的热爱。

1962年3月18日，外公如往常一样，拄着拐杖前往台湾大鹏剧社看戏，剧社的第一排还留出一个位子作为外公的专座，那天台上演的是一出新排的剧目。看到中途，外公手中的拐杖不知怎的，滑落在地，遂弯腰去捡，却再也没有起身。这一年外公八十五岁，走完了他为戏而来，为戏而去的传奇一生。

我的回忆写到这里，本应结束了。但不说一外公居住了半个世纪，我度过青春年华的齐家大院，好像意犹未尽。齐家位于东单附近的西裱胡同31号，与原北京日报社斜对面，它们在路南，我们在路北。一个大门内有平行的四座院落，分

别住着外公三兄弟一大家子人。大门的门柱上钉着一块木牌，上书“高阳齐寓”。大院内树木葱茏，花草繁茂，有杏树、梨树、核桃树和枣树等果木，有四从枝繁叶茂的白丁香、紫丁香，还有三架葡萄和用杉篙搭成的大藤萝架。每当藤萝花盛开的时候，北京著名的糕点店“东致兰斋”会来采摘，做成藤萝饼再回送一些给我们。外公住在最东边的院子，三间北房是他的书房。这里，经常高朋满座，来的都是文化艺术界的名流、京剧名伶，可谓往来无白丁。作为一个孩子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生活方式。天暖时，吃饭是在院中大树下放几张矮桌大家围坐在小板凳上，院中花草数目多，空气清新。虽是大锅饭吃的不算讲究，但注意营养，人多热闹吃起来特别香。吃水果也是按人头平均分配，外公走后仍按此规则运行。到大家庭生活结束时，我们姐妹也都陆续大学毕业了。如今齐家大院已被高大建筑所取代，我这个老住户到那里也难寻其踪迹。如果，在高楼林立间，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旁，有那么一所文化名人故居，那会给都市带来多么厚重的人文气息。每当想到此，有一种惋惜，一丝惆怅在心头。

去年秋天，我和表妹夫妇、表弟妹四人去台湾祭奠外公。外公墓地坐落在台北郊区阳明山的金山墓园，专程从台中赶来的二舅的女儿齐克靖告诉我们，外公的墓朝着大陆的方向，盼着能回到故里，回到亲人身边，令我们不胜唏嘘。



《恒蹊留痕》，齐如山著，中华书局出版



齐如山1950年代在台北家中

来接我们，从天津来到北京那时已是1947年冬季了。

来京后，外公十分关爱我们，每天从东单西裱胡同的家步行到我们当时住的南河沿蒲苇河，来看我们。生怕我们不适应，生怕我们受委屈。有时间还带我们出去遛弯，遇到好吃的就买给我们吃，姐姐还记得吃炸咯吱盒的情景。

来到外公家不但生活安定，更

卷、精通诗词、韵律，为研究戏剧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其二，当时的京剧界思想偏于保守。相对来讲，我外公的眼界、思路都比较开阔。晚清政府为培养外交、外语人才，开办了同文馆，外公十七岁即入馆学习法语、德语以及化学、算术等现代科学。庚子事变后该馆停办，外公已学习五年。在1908到1912年间外公三次去欧洲

张打油、胡钉铰，在古代诗坛，他们只能算是与诗搭了点边的边缘人物，但要说写打油诗，他们则是最著名的人物。史书上当然没有他们的位置，但野乘杂抄里却留下了他们的逸事和传说。他们虽不入流，却毕竟与文化史有关。所以，考查一下他们的事迹，还是有意义的。

大家都知道，打油诗之“打油”二字，出自人名张打油。张打油确有其人，有学者认为他是唐朝人（但证据不够结实），也有的历史材料说他是元朝人，并说他曾在河南开封做过官。相传张打油擅作诙谐通俗的诗，其代表作是《雪诗》：“江上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”其观察之细致可谓慧眼，用语也很巧妙，老妪也能看懂，看后还要哈哈大笑。张打油虽有大名，但他的诗留传下来的却不多。没有人，也没有办法为他编诗集，他的那些打油诗只是散见在一些笔记杂著中。

偶翻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，见到所收入的明人李开先写的《词谱》，记下了一段关于张打油的掌故，其中提到了张打油写的一首诗。这段掌故和诗，甚有趣，但

知道的人不多，这里抄录下来，与读者共赏之。

（开封）参知政事，厅后作一粉壁。雪中升厅，见有题诗于壁上者：“六出飘飘降九霄，街前街后尽琼瑶。有朝一日天晴了，使扫帚的使扫帚，使锹的使锹。”参政大怒，曰：“何人大胆，敢污吾壁？”左右以张打油对。答以：“某虽不才，素颇知诗，岂至如此乱道？如不信，试别命一题如何？”时南阳被困，请禁兵出救，即以为题。打油应声曰：“天兵百万下南阳。”参政曰：“有气概！壁上定非汝作。”急令成下三句，云：“也无援救也无粮。有朝一日城破了，哭爷的哭爷，哭娘的哭娘。”依然前作腔范。参政大笑而舍之。以是远近闻名。

第一首诗中，“六出”一词，是雪花的别称。花分瓣叫“出”，雪花六角，故称“六出”。张打油写的这两首题壁诗，都是前面一两句既庄且雅，后面则谐趣而通俗，令人忍俊不禁，难怪参政大人“笑而舍之”，不再追究张打油在官厅上题壁的行为。张打油就是靠了这种通俗诙谐的打油诗而远近闻名的，

## 从张打油说到胡钉铰

■李乔

而他本人的名字也最终成了打油诗的标识。

但打油诗的标识性人物，却并不只张打油一人，还有一个叫胡钉铰的。在明清时代，文人论诗，当提及打油诗人时，常常是张打油、胡钉铰二人并提。例如，明代大诗人杨升庵评论张祐的诗时说：“张祐诗虽佳，而结句‘终日醉醺醺’，已入‘张打油、胡钉铰’矣。”又在评论韦应物的诗时说：“吴中盛文史，群彦今汪洋。方知大藩地，岂曰财赋强。”乃类张打油、胡钉铰之语。”清代文人林昌彝著有《射鹿楼诗话》，评论诗人赵翼说：“赵诗品格浅俗，如打油、钉铰，此调断不可学。”从杨升庵的林昌彝的诗评中可以看出，胡钉铰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打油诗人，有名到了堪与张打油齐名的程度。钱锺书先生曾称胡钉铰为“张打油之流亚”。据说钱先生曾给擅诗的吴忠匡教授写信，赞其诗曰：“尊诗贤于赵指铰、郭打油远矣。”赵指铰朴拙，郭指铰沫若，所含典故即张打油、胡钉铰事。

对于张打油其人其诗，懂一点打油诗掌故的人都知道一点，但对于胡钉铰，恐怕人们就一点陌生

了。

关于胡钉铰其人，《辞源》上有几句简单的介绍：“唐贞元元和间人，名本能。以钉铰为业。能诗，不废钉铰之业。远近号为胡钉铰，其本名转不著。”一语说其本名叫胡钉铰。看来，胡钉铰也是个史上人物，他这个“钉铰”之名，实际是一个绰号，得自于他从事的钉铰之业——拾掇、修补锅碗器具之类。胡钉铰既能写诗，又不废钉铰之业，看来是个“文武兼备”，带着一二儒者气息的体力劳动者。

胡钉铰的事迹和传说，唐人范摅所著《云溪友议》卷九记载最详：里有胡生者，家贫，少为洗铰钉铰之业。偶遇甘果、名茶、美酝，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堂，以求聪慧，而思学道。历稔，忽梦一人，刀划其腹开，以一卷书置之于心膈，及觉，而吟咏之句，皆特美之词，所不得不由于师友也。既成卷轴，尚不弃瑕瑜之艺，真得隐者之风，远近号为胡钉铰。

这真是一个存心向学，努力上进的青年。家贫而不废求学之念，干着钉铰的猥陋手艺，却仍想着学

道。这样的青年，在那个时代委实是难得的，若是在今天，恐怕就是那种虽家贫却仍能考入北大清华的学子了。但此君颇有些迷信思想，为求聪慧，竟祭拜先秦道家名人列御寇，以求佑助，又因为总想着迅速成才，竟产生了破腹置书的梦境。

胡钉铰写的诗，《全唐诗》竟收了四首，可见他写过一些不错的诗。代表作据说是《小儿垂钩》：“蓬头稚子学垂纶，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，怕得鱼惊不应人。”写小儿垂钩时的天真、童趣，蛮有诗意，绝不像“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”那样俗白。但他之所以能与张打油齐名，肯定是因为他曾写过不少类似“黄白狗”之类的打油诗，只是那些打油诗没流传下来罢了。

这个胡钉铰，后来被神仙化了。在通俗演义小说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中，他成了一个颇具神通，类似于鲁班那样的能工巧匠。此书第十七回“宝船厂鲁班助力，铁锚厂真人施能”写道，有个叫胡定教的真人，本是天上的左金童，后来化身为钉铰的，自称是山东莱州府蓬莱县人氏，

自幼会钳各色杂扇的钉角儿，故人称“葫芦钉角”。又写道，在郑和的宝船厂中，他大显神通，铸造铁锚，使郑和能够顺利地乘船下了西洋。这个小说里的胡定教，其实就是胡钉铰，在这里，胡钉铰已被神化成了天界金童、真人，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仙。

这个胡钉铰，除在杨升庵等文人眼里被视为打油诗的代表人物之外，在民间，他还被金匠、银匠、铜匠、铁匠、锡匠和小炉匠奉为祖师爷。如民间俗典《玉匣记》上说：“铜匠、锡匠、银匠，俱胡钉铰之神。”胡钉铰，即胡钉铰。这些工匠之所以奉胡钉铰为祖师爷，显然是因为胡钉铰曾“为洗铰钉铰之业”，是自己的“行业祖先”，而那些神化、仙化胡钉铰的传说故事，则更加强化了他们奉胡钉铰为祖师爷的信念。

关于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中的“葫芦钉角”之类故事的来源，我没有考证过，但我想，那些崇奉胡钉铰为祖师爷的工匠，应当是这些传说故事的重要创造者，他们既参加了神化祖师爷的过程，又对神化之后的祖师爷深怀着笃信和崇敬。